

# 向党靠拢：新中国成立前后知识分子的自我调适\*

——以《建国日记》为中心

丁 芮\*\*

**摘 要**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转型时期，普通知识分子喻世长积极投身学校活动，并根据环境与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在此过程中，喻世长有过不适与矛盾，但因亲身经历过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内心一直憧憬着新时代的到来，他的思想的转变具有明显的主动性、自觉性。知识分子喻世长主动向新政权靠拢的个人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思想变化的过程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个案可成为思想改造中“强制说”不能成立的一种符合历史场景的注解。

**关键词** 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 政治转型 自我调适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约有 200 万人，其中高级知识分子约 10 万人。大多数普通知识分子有着相似的求学经历、心理历程、价值认知等，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知识界的整体面貌，决定整个知识界的历史走向。了解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对时局的认识和适应，对生存境遇变化的应对，就不得不去研究那些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因为他们才真正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总体概念。<sup>①</sup>

喻世长（1916~1999）是中国民族语言学者，主要从事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音韵学研究。他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担任过中等师范院校的教师，

---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研究”（项目号：21ZDA074）阶段性成果。

\*\* 丁芮，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① 参见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前言”，第18页。

后在北京大学及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当属知识分子的一员。相较于那些在社会上有一定声望的知识分子，喻世长应该属于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也就是普通知识分子。<sup>①</sup>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系列政治、社会、思想文化运动过程中，包括喻世长在内的众多知识分子的行为和心理发生了变化。这种主动向新政权靠拢的变化更多地来自自身对政治、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观察、理解与体验，而非政治上的强制。

个案研究是宏观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在个案研究里，各种复杂的思潮、观念、心态交织在一起，有一种逼真感，更能达到分析的深度，历史的还原性更好。<sup>②</sup>本文以喻世长的个人经历为个案，以公开出版的喻世长日记《建国日记》<sup>③</sup>为核心史料，关注从旧政权进入新社会的普通知识分子，对其行为和心理变化进行解释，考察在政治大变动时期普通知识分子如何进行自我调适以及如何融入新时代，以此认识新中国成立对普通民众的深刻影响，并与现有研究成果异同互见。

## 一 喻世长工作轨迹的变动

### （一）入职北大

喻世长 1939 年考入辅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43 年毕业。在辅仁大学学习期间，喻世长成绩比较优秀，1941 年度学业成绩全班第一，获得校长陈垣亲发的勤字奖章及证书（1942 年 9 月获得）。喻世长在辅仁大学期间，受教于沈兼士、陆宗达、于省吾、戴君仁、周祖谟等知名学者。在诸位学者的指导下，撰写音韵学、训诂学论文，为之后从事语言学研究打下了基础。<sup>④</sup>

1948 年元旦假期，已经 32 岁的喻世长正在经历他的“沧桑之变”，离开已经工作了四年多的河北省保定女子师范、保定师范专科学校。<sup>⑤</sup> 面临失

① 喻世长在语言学界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社会上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在整个知识界也只能算作普通知识分子。

② 许纪霖：《知识分子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首版自序”，第 10 页。

③ 喻世长一生都有写日记的习惯，目前所知，他的日记从 1948 年到 1999 年，共有 80 多本，其中 1948~1950 年的日记以《建国日记》出版。关于其日记的具体情况及史料价值，作者已另文撰写。

④ 喻如菊：《人生识字忧患始——忆兄长喻世长》，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东方出版社，2009，“代序”，第 1、7 页。

⑤ 喻如菊：《人生识字忧患始——忆兄长喻世长》，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代序”，第 7 页。

业的危机，他满心的“怅然若失”。这个情况，他不能告诉家里的姑姑和妹妹，“只能勉强欢笑”。此时，有个朋友给出了个主意，让他去找曾经的大学老师周祖谟<sup>①</sup>。周在北大任职，他询问了喻世长的生活状况，考虑为其在北大谋个职位。周祖谟主动帮助喻世长在北大谋职也证明了其在辅仁大学求学期间成绩非常优秀。周的主动帮忙让喻世长非常高兴，回去的路上觉得自己“已完全变了另一个人”。此时的喻世长绝对没想到，这一天周的“顺口”一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sup>②</sup>

此时，中国的命运也在发生改变。1947年下半年，中共军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进入1948年，形势进一步向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迅速发展，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中共开始着手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关于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中国的时局处在即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关键时刻。

身处北平的喻世长对时局一直颇为关注，但在周祖谟说要帮他谋北大职位时，喻世长更关心的还是怎样在物价高涨下安置生活。<sup>③</sup>1948年春节过后，失业的喻世长心境非常差，自己形容是：“完全近于疯癫了，抑郁，烦闷，焦急，气愤，昏迷，哀痛，到此刻又转入于半麻木状态了。”<sup>④</sup>突然得知4月1日可以去北大上班了，十分高兴，立刻觉得“可以解放一下生活了”。<sup>⑤</sup>

1948年3月30日，喻世长先到北大与同事见面。此时他“有些迷惘”，感觉“一切都像梦”，“不知道这环境是什么样子，也有一点恐惧，因为北大局面大”，但抑制不住内心的“得意”。对他来说，北大是“站在领导的地位”，是“令人向往的一个环境”。<sup>⑥</sup>4月1日是喻世长“大书特书”的日子，他正式到北大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上班，担任助教，并对180元的底薪表示“不失望”。<sup>⑦</sup>喻世长沉浸在激动之中，他并未意识到新旧政权

① 周祖谟（1914~1995），字燕孙，中国文字、音韵、训诂、文献学家。1939年被聘为辅仁大学国文教员，后被聘为国文系讲师、副教授，讲授过语音学、等韵学、高本汉中国音韵学、比较训诂学、甲骨文研究等课程。1947年改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文科研究所秘书、图书馆专门委员、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委员。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页。

③ 丁芮：《“疯狂”到“稳定”：从民众视角看北平解放前后的物价变动——以〈建国日记〉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9年第2期。

④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16页。

⑤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3页。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5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7页。

交替下的北大将会使他体会不一样的工作环境。

1948年元旦过后的一段时间内，喻世长处在失业的状态（不是完全没工作，他在中学代课、做家庭教师），但他已经开始准备把之前大学以及保定工作期间的稿子、卡片加以整理，撰写论文，也在考虑自己做研究的事。<sup>①</sup>初入职的喻世长认为北大的环境和学术氛围都是好的，自己对于进一步做学问的路径，也已摸索出一些了。<sup>②</sup>5月21日，喻世长开始接受任务，整理音韵学家罗常培所给的两箱子卡片。<sup>③</sup>之后，在解放前的时间内，喻世长按部就班看语言学的书，听前辈语言学家的课，查资料，作论文。<sup>④</sup>1949年元旦当日，喻世长总结自己的工作道：“正在写着，至少我自己以为相当于成熟的论文。”<sup>⑤</sup>在这期间，喻世长遇到过一些人际关系问题，使他痛苦、迷茫，但考虑到刚到北大，不该轻易发作，劝自己要忍耐。但逐渐地，他开始感觉到北大的职业环境“不易应付”了。<sup>⑥</sup>

喻世长入职北大后，有了稳定的薪水，虽然物价不断高涨，但生活相对来说还能过得去，此时的他更关心时局的发展。1948年12月，平津被围，喻世长敏感地察觉到时局的变化，认为新时代就要来临，也想到“研究所虽然是个‘有前途’的事，但是那里人事上是那样艰涩，没有融融之乐”，便思索自己能继续多久，以及自己的成就“难道就在语言学这方面了吗？”<sup>⑦</sup>

## （二）接管时期的工作状态

喻世长感觉到了时局的变化，但对于北大和自己的命运都还不确定。随着解放战争朝着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发展，1948年初，中共已开始考虑如何接管国民党文教、宣传机关，以及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1月18日、7月3日，毛泽东分别发表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央宣传部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办学方针的指示》，强调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

①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13、16、10页。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8、72页。

③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72页。

④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164、197页。

⑤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37页。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161、204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26、230页。

是党的重要任务。<sup>①</sup> 1949年4月，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发表《约法八章》，宣布“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sup>②</sup>

1948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平津包围一周后，发出了《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同日，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文化接管委员会。<sup>③</sup> 1949年1月10日，清华被接管后，北大就已在传要被接管，身处其中的喻世长觉得北大的接管“有些‘拖’”。1月22日，喻世长听同事说“一二日就要接收”。<sup>④</sup> 2月3日，人民解放军入城接收北平防务，北平正式解放。北大师生集体赴西直门，欢迎入城部队。<sup>⑤</sup> 军管会接管清华、北大的原则是“实际接管而形式上是维持原状，同时宣布必要而且可能的改革”。<sup>⑥</sup>

2月3日，解放军入城，这对北平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喻世长觉得，对于北大文学研究所来说，亦是如此。北平的解放倒没有在喻世长“心上怎样的波荡”，而文学研究所的解放，他自认为“几乎”是他“促成的”。北平解放后，喻世长觉得，北大解放的新时代也到来了。因为喻世长对北大“官僚化的作风，教师是学阀，职员是官僚的现象十分看下去”，又觉得周、罗给他“相当的痛苦”，罗要他来“敷衍”同事，周要“另外给他工作”，他们拿他“当奴才看”，而“就学术上论，也太个人化了”。就和同事联合起来讨论，决定对“恶势力斗争一下子”，“各抒一腔愤懑”，最后议决2月3日下午起自动放寒假，并写信通知所长与秘书。<sup>⑦</sup> 喻世长和同事希望，北大“接收之后，再进一步地要求自由”，<sup>⑧</sup> 以及“表示一下讲师们的地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54~61、358~360页。

② 毛泽东：《关于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问题的电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951年1月~1951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第258页。

③ 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509页。

④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53页。

⑤ 叶向忠：《新生的北京大学——学生工作的根本转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的黎明》，北京出版社，1988，第344页。叶向忠在解放初期曾任北京大学党总支副书记、书记。

⑥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关于接管清华、北大，维持燕大的专题报告》（1949年4月1日），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年）》，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10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62页。

⑧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63页。

与身份”。<sup>①</sup>

2月26日，北大的移交清册赶出来了，喻世长的心情平静些。<sup>②</sup>2月28日，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北大，下午2点开全校大会，举行接管仪式。<sup>③</sup>喻世长在北大民主广场听了钱俊瑞的讲话，认为钱的讲话“条理和内容，都满够的”，只是担心钱讲话中说的“许多要求改造的话”研究所会不会搞糟。<sup>④</sup>3月2日，文学研究所被接管。<sup>⑤</sup>喻世长开始感受新政权下不一样的工作环境。

### （三）工作单位的变动

从1949年2月3日喻世长和同事们自发地联合起来，满怀激情地开始对北大的官僚作风进行斗争，积极争取讲助权益。但喻世长想改造所内官僚风气的激情受到了打击，于是他产生了离开北大的想法，想申请参加南下工作团，但汤用彤、向达和他谈了话，劝说他“认清那边工作重要”，“要把革命与建设两方，比较难易，而做难的一面的才算有勇气”，又说研究所最近渐渐趋于合理化。<sup>⑥</sup>研究所趋向合理的前景给了喻世长留下来的信心，他决定不走了，转而“积极做关中音系”，去听课学习，学校的活动也让同事代他去参加。<sup>⑦</sup>

受到打击后，喻世长认识到，改革是“长远的路程，耐性的走，不要着急”。冷静地想过后，他觉得不如先努力改造自己更好些，<sup>⑧</sup>对于所、校内事务明显没有之前费心思了，但还积极参加所内改革事务的工作，关心所和学校前途。<sup>⑨</sup>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5月4日，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汤用彤等19位教授、2位讲助代表、2位学生代表等23人为校务委员会委员；汤用彤出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学校校务由校务委员

①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77页。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79页。

③ 《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关于接管清华、北大，维持燕大的专题报告》（1949年4月1日），陈大白主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949~1976年）》，第11页。

④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80页。

⑤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81页。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21、322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23、324页。

⑧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34、335页。

⑨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28、330、369、373、377、380页。

会主持，派驻北大的军管代表和联络员随之撤离。<sup>①</sup> 1949年6月29日，北大决定成立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筹委会。10月15日、16日，北京大学教职员联合会（简称“教职联”）正式成立，并开始向工会过渡的工作。12月24~31日，北京大学工会第一届代表大会在北楼礼堂举行，通过了《北京大学工会章程》。<sup>②</sup> 12月24日，喻世长参加了此次大会，<sup>③</sup> 但他感觉工会的事，因为人事斗争复杂，“好难应付”，以致自己“精疲力竭”。

对于解放后一年内工作上的波折和心理变动，喻世长自己有过反思，他在1950年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脑中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有矛盾，我一面想顺其自然的求自己政治地位的成就，一面又想积极一下。……一面想先把自己的本领充实，一面又愿抽出一些时间作别的活动。”<sup>④</sup> 就这样，屡屡受挫的喻世长对校务工作逐渐“不感到兴趣”，对北大的环境也渐渐生“厌”。<sup>⑤</sup> 1950年3月7日，喻世长听说罗常培要就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他和另外两名同事也许要一起去。<sup>⑥</sup> 到北大快两年了，工作、人事上的纷争，让喻世长“很觉寂寞，烦躁”，听到去中国科学院的消息，他决定“死心踏地作研究工作”，要“重新作人”，“不顾什么小的关系”，“不去参加那无味的大课”，要多读书，找出做学问的路。<sup>⑦</sup> 5月23日，罗常培正式通知喻世长以助理研究员的名义到中国科学院。<sup>⑧</sup>

1950年6月，在北大工作了两年多的喻世长正式调到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sup>⑨</sup> 之后不久，喻世长参加了中央访问团，前往贵州进行了6个月的调查，开始了自己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sup>⑩</sup> 自此，喻世长的工作单位固定了下来，研究方向也基本确立。

- 
- ① 《“十七年”（1949~1966）新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及演变》，杨河主编《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北京大学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第49页。
- ② 《“十七年”（1949~1966）新的管理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及演变》，杨河主编《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北京大学文化研究》，第51页。
- ③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11页。
- ④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26页。
- ⑤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29页。
-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70页。
-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73、589页。
- ⑧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627页。
- ⑨ 中国语言学会《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编写组编《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第1724页。
- ⑩ 丁芮：《“沟通民族情感”的桥梁：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贵州调研的情况考察》，《贵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5期。

## 二 迎接新政权的准备

### （一）憧憬新社会

进入1948年，时刻关注时局发展的喻世长已在“憧憬着最近的将来，有和平的可能”，希望能够“换一个自由的空气”，改变这“一切都是灰色的”“不合理的社会”。<sup>①</sup>在解放军东北战场还未取得完全胜利时，喻世长已经察觉北平即将发生变化。喻世长幻想着在即将来临的新社会，自己“有了广大的田地”，便可以抨击“封建势力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束缚”，“唤起他们粉碎封建的遗骸”。<sup>②</sup>

喻世长并不知道，他的这种改造知识分子落后思想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与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共产党政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不谋而合，只是，他也属于被改造对象。1948年7月3日，中共中央向各地党的领导机关转发关于新区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电报中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要办抗大的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知识的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sup>③</sup>同一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给晋绥分局等的指示》中指出，对于学生、教员和知识分子，“应依靠其中较进步的分子，从思想上去说服教育改造他们。办法可利用讲演会、座谈会、辩论会等方式，进行时事教育及理论上的辩论与说服，可以具体生动的事实，启发他们认清解放区与蒋占区之光明与黑暗及真理之所在，说明蒋必败我必胜的形势，和中国的前途出路，争取他们开始转变。进而给以新民主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逐步改造他们”。<sup>④</sup>

1949年元旦后，“大局和局部的‘和’都在进展”的时候，喻世长越发相信和平不久就会到来，他憧憬着新社会，脑海中幻化出城市乡村“一切全是焕然一新的景象”，思考着“以什么姿态来给社会服务”，并为“大

①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1、113、169页。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30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1948年7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册，人民出版社，1980，第24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351页。

时代的变革中”自己“不能参加任何（革命）工作”而“苦恼”。<sup>①</sup>和平即将到来，让喻世长很兴奋，他在同事中讲说“许多政治大势”。<sup>②</sup>2月2日，北平联合办事处正式成立的当天，喻世长的心情反而“不像抗日胜利的喜悦”，因为他觉得一则“革命的对象是自己的同胞，不论他们怎样腐败顽钝，终不免对之有些怜悯”；再者是“自己没有早早侧身革命行列”，虽然他“扪心自问不是革命的对象”，但担心新政权说他“站的地位是被革命的一面”，他“没法解脱”。<sup>③</sup>

## （二）通过阅读认识新政权

怀着这种遗憾又担忧的心理，喻世长急于表现出对新政权的积极态度。2月3日，喻世长没有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的仪式，而是和年轻的同事们联合起来，开始发动对学校官僚作风的斗争。同日，喻世长听到了“没有娱乐项目，只有消息与文章”的新华社广播，感受到了“另外的一种生活空气”。<sup>④</sup>

北平解放后，喻世长自认对环境与时代“认清”了，<sup>⑤</sup>立刻满怀激情地投入“革命活动”。<sup>⑥</sup>这种积极的行为是他为未能早早参加革命的遗憾的一种弥补。从上文可知，喻世长投入学校工作的满腔热情屡屡受挫，直接导致他开始反省自己的工作和思想。1949年4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不应该再有什么‘个人烦恼’的时代了，但是我因为没有彻底进步，所以一切生活，意识，仍不免有旧的因素，因此我仍旧有个人烦恼。但这也不是我自己之过吧？”短暂的犹豫之后，他认识到，“改变就有前途，有光明，有快乐，不改变就依然是处在矛盾与苦闷中，甚至还要疯了，那是多么可怜的傻事”，“既然知道了自己过去的短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所以，他“不能再这样活下去了”，“要根本改造”自己。<sup>⑦</sup>而改造自己的方式就是在“读书与思想上”。<sup>⑧</sup>

①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52、242、246、242、259页。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55页。

③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60页。

④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62页。1949年1月31日，北平市军管会文管会接管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北平分社，2月2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第511页。

⑤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66页。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64、270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06页。

⑧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11、403、446页。

确定了改造方向之后，喻世长开始了实践。4月8日，喻世长就从图书馆借了两本哲学书，并在院中一口气读了半本《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并到市场买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马恩科学的文学论》等书。这一天喻世长非常兴奋，想着自己的改变，“决定抛弃旧生活”，“从现在起可以彻底地重新读书，重新思想”。<sup>①</sup>

喻世长决定把更多精力放在读书、思想上。除了研究所用书籍外，据其日记记载，从1949年4月到1950年7月贵州调查之前，喻世长所读（借阅、购买）图书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及哲学相关图书，如《艾思奇的哲学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马恩科学的文学论》《新兴哲学体系》《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史》《论人民民主专政》《新哲学大纲》《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第三国际的历史任务》《修改党章报告》《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经济纲领与阶级利益》《新哲学论集》《列宁主义基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社会史论》《中国社会经济史》《德国农民战争》《中国民族简史》等；<sup>②</sup>第二类是时代、文艺类图书，如《美学》《谁应为战争负责》《高尔基论文》《生活与美学》《李有才板话（十三种）》《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世界知识》《罪与罚》《中苏文化》《新中国妇女》《中国语文的新生》《苏联的恋爱婚姻与家庭》《苏联医学》《新文字周刊》《新文艺》《新建社》《苏联文学史》《新儿女英雄传》《被开垦的处女地》《骆驼祥子》《观察》《日出》等。<sup>③</sup>

通过读书，喻世长觉得虽然“效力不那么快”，但“对于思想的廓清，更近了一步”。所以，即使生活不那么宽裕，有限的薪金还得用于购买食粮，他也“更想买书”。<sup>④</sup>1949年7月5日那天发薪，喻世长一次就选了13种书，包括马恩及马列主义类的，《新哲学大纲》《李有才板话》等，花了1800元，他甚至认为“每天都能买本书看”，“就不会苦恼了”。<sup>⑤</sup>

喻世长在读书的过程中得到了精神愉悦，也时常反思自己，提高思想

①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09页。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09、310、314、318、369、372、381、451、456、478、488、492、510、580、589、591、603、676页。

③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18、310、314、318、369、372、398、404、405、410、450、473、480、523、544、568、574、591、613、617页。

④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10、345页。

⑤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69、473页。

认识。如读《共产党宣言》使他在“情绪上”“更接受了一些温暖”。<sup>①</sup>他在读《新哲学大纲》中“发现了哲学理论与文学的关系”，“想出几个研究文字遗产的路子”，“久久长没有这种读书的高兴了”，“像是发现了一个天！”<sup>②</sup>而从卞之琳的一篇文章里，他看到英国诗人拜伦、雪莱、济慈等是“把革命等于超世论”，便反思自己与他们有些相同，“有革命的热血而没有革命的道路，所以弄得有些超世的思想”。<sup>③</sup>

在读书的过程中，喻世长也会从书中发现“一些自己研究的田地”，他在读《中国社会经济史》，便很高兴可以由这里“引到训诂名物学的研究上去”。<sup>④</sup>在读丁浩川的文章时，喻世长心里想到认识与语言的关系。<sup>⑤</sup>喻世长“没有一天忙的没有拿书本的时间”，但“有许多生活上的事压着”他，使他“心情不干净”而不能很冷静地读书，<sup>⑥</sup>为此，他很苦恼，希望“多读一些马恩的历史著作”。<sup>⑦</sup>

### （三）听演讲、学俄文紧跟新形势

喻世长通过大量阅读马列主义有关的著作和上马列主义课程来接受马列主义的思想，并以此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而在这一过程中，喻世长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在对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请示的批示中提出，“抓紧思想上领导”，“应具体化为组织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有限地规定题目，好好准备在原定大学进行学术讲演，其内容主要是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由各校校务委员会或学生会聘请他们去讲演，此种讲演在各大大学都要进行，不仅文学院”。<sup>⑧</sup>按照这个指导思想，从1949年4月开始，北大连续多次举办了相关演讲。喻世长对听演讲比较积极，范文澜、汤用彤、钱端升、叶向忠、周扬、缪朗山、冯至、赵树理、艾青、薄一波、

①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81页。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03页。

③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73页。

④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92页。

⑤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83页。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55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617页。

⑧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大学的处理方案向中央并华北局、总前委的请示》（1949年3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的和平接管》，北京出版社，1993，第404页。

钱俊瑞、李达、陈毅<sup>①</sup>等人在北大演讲，他都去听了。1950年4月26日，郭沫若在北大演讲，听众很多，喻世长早早到场，却已没有座位，他在房后台阶上听了一小时。<sup>②</sup>喻世长偶尔还到外面去听演讲，如1950年6月6日，他到辅仁大学听苏联学者讲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在听演讲的过程中，喻世长常常觉得很有收获，如他认为张宗麟关于“做党的工作的态度有九点注意”的讲演“讲得很好”，能对照自己发现“缺点”。听艾思奇讲唯物论辩证法，自己收获颇多。<sup>③</sup>听演讲也是喻世长行动进步的一种方式。

1949年暑假，新政权开始真正着手从政治上干预大学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1949年7月初，华北高教会议做出决议，所有高等院校，不论公私，都要设置共同必修的政治课三种，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含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新民主主义论（含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等）。11月22日，中共北大党总支明确指出，有步骤地改革学制，增加政治课，并确定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的比重。北大新增开课程主要是马列主义政治课以及结合实际的课程，停开的课程主要是党义一类的反动课程以及有些系级课程太重而又不需要的课程。<sup>④</sup>

随着北大课程设置的调整，1949年11月3日，喻世长开始考虑要听政治课。<sup>⑤</sup>之后，听政治课便成为喻世长在北大的工作之一。喻世长从课堂上“体验到许多教学与当小组长的经验”，一些教师的“报告都很好”，但一些无教书经验刚毕业的研究生所上的政治课，让他觉得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sup>⑥</sup>

相较于政治意味比较强的政治课，喻世长更愿意上俄文课。在各大院校开始俄语课之前，爱好文学的喻世长就对苏联文艺有很强的兴趣。1949年3月10日，他开始抄苏联高等教育资料目录，<sup>⑦</sup>陆续阅读了大量的苏联文艺和时政论著，并从中发现了“衷心佩服的理论”，指示着自己努力的方向。

①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34、511、319、325、326、370、443页。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608页。

③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638、312、328页。

④ 叶向忠：《新生的北京大学——学生工作的根本转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的黎明》，第347~348、346、355页。

⑤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65页。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71、515、579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87页。

向,<sup>①</sup>还把作品中的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行比较。<sup>②</sup>1949年9月、10月,喻世长开始自学俄文,<sup>③</sup>11月1日,喻世长听俄文课得到罗常培的同意,第一次开始在北大听俄文课,虽然课已经进行到第九课,但喻世长很“有信心”,认为自己“可以追上”。<sup>④</sup>此后至到贵州之前的几个月内,喻世长对俄文的兴趣很大,坚持上俄文课,几乎每日都会记几个俄文单词,还买了俄文语法、俄英字典,把俄文生字写到专门的卡片上、日记本上,以便随时都能拿出来看。<sup>⑤</sup>学习苏联论著后,喻世长结合自己的生活境遇,得到了“许多启示”,好“像发现了新生命的源泉似的”,对于个人和时代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还曾充满激情地想要写《向自己主义告别》《你为什么不歌颂新时代》这样的小诗。<sup>⑥</sup>

### 三 思想的主动调整

#### (一) 反省思想中的不“纯洁”

1949年4月,北大的政治学习刚刚开始,还处在自愿、自发、自由的阶段时,喻世长已经开始反省自己思想中的不“纯洁”,其中,小资产阶级意识和个人主义是两个需要改掉的“恶习”。<sup>⑦</sup>1949年9月18日,喻世长和屯举行结婚典礼。在婚礼上,喻世长用了花车、乐队等,但事后立刻反省说是“小资产阶级形式的婚礼”。<sup>⑧</sup>喻世长是家里的长子,平日里非常操心父母和四个妹妹以及爱人屯的生活,在得知家中房子出了问题时,他感觉到了压力,想要给他们安慰,但太过担心家里,使他觉得与别人对他的“要求很高”不符,便反省自己:“尽量提高自己,使党方看见我许多优点,使罗(罗常培)看见我的本领,但是我的心是脆弱的,我有许多牵挂,我有着痛苦的家,我放不下他们,我的精神受到煎熬,工作受了影响。”<sup>⑨</sup>喻

①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06、314、415、444页。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51页。

③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48、452页。

④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65、464页。

⑤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41、587、489、588、593、544页。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44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07页。

⑧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22页。

⑨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782页。

世长认为，过去他“太强调个人”，“看不起人，重视天才，容易武断地判决一个人的价值，如果判断谁不值钱，就永远看不起他了”。这种个人主义的意识使他“太强调个人工作，个人前途，因此稍有不如意就患得患失，不是沮丧就是高兴，特别脆弱与感伤”，经过反省，喻世长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一定要改。<sup>①</sup>

1949年4月，在开始改造自己思想中的不“纯洁”时，喻世长也开始学习报刊上的时事文章，把与他有“同感”的句子“圈出来”，准备他的“自白书”。<sup>②</sup> 1949年10月26日，在喻世长认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是“失败的”，同时又担心第二年暑假北大改组，人事调整，不知道自己将到哪里去的时候，便开始考虑要写一篇自传，<sup>③</sup> 并考虑往哪里“投递”。<sup>④</sup> 喻世长这种思想改造的自觉意识比较早，在此之前，虽然有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如郭沫若、李达、张友渔、史良、陶大镛、林砺儒、孙起孟、黄炎培、马叙伦等发表谈话、文章，或者号召知识分子进行学习与改造，或者对政治学习运动表示热烈的响应，但还没有知识分子发表公开自我检讨。最早公开发表检讨的有影响的人物是朱光潜和冯友兰。《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发表朱的《自我检讨》，28日发表冯的《检查我的学习》。著名知识分子的检讨，既是一种政治姿态，又能成为政治上、思想上保守落后的学者欣然接受思想改造的榜样，推动政治学习运动。他们的自我检讨同时也是思想总结的范文。<sup>⑤</sup>

1949年10月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喻世长不止一次考虑要发掘自己的思想根源，改造自己，写自传，进行自我批评。<sup>⑥</sup> 但付诸行动的直接诱因是12月6日在工会基层小组组长选举时的落选。落选后，喻世长心有不甘，“想了半日”，想到“要写自传，往报纸上发表”，“用这种方式来与当选的组长们斗一斗”。<sup>⑦</sup> 著名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检讨对喻世长下决心写自传也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但从他日记中的记载来看，喻世长萌发写自传

①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28页。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10页。

③ 喻世长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自传（思想总结）。”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613页。

④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57页。

⑤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第34~35页。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73、474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95页。

并考虑投递出去要早于《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这也可以说明，喻世长通过写自传对自身进行检讨、改造具有主动性、自觉性。1949年12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此前政治学习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活动”，此后则是以自我检讨、群众批评、人人过关为特征的“运动”，思想总结的做法在知识分子中间得到推广。<sup>①</sup>

## （二）全心投入写自传

12月7日，喻世长正式投入写自传。当日，他“想了一些自传中的重点”，并且“着实想了好几套”方案。<sup>②</sup>第二日一早，喻世长就在想，他的“这篇东西写出来一定很动人，渐渐入了佳境”。<sup>③</sup>之后一段时间内，写自传在喻世长的心中“占了重要地位”，<sup>④</sup>但这种自我检讨的自传写作并不是很顺利，有时他觉得自己的“思想没十分弄通”，不知道这样的文章该怎样写，写写删删，很长时间也写不出几百字。喻世长便自己想办法，在空闲的时间把“零碎的思想检讨的话，写了十几个小条，等想全了，再往一齐接”。<sup>⑤</sup>

喻世长写自传具有很强的主动性，“起初能够很冷静地写”，但写着写着“又觉得那些话是空的，没有什么内容”，认为写这样的文章等于应付。所以，喻世长在写的过程中时常“迷惘”，不确定是自己“真的过去没什么错误呢？是不肯改造呢？是不愿写这种官样文章呢？”<sup>⑥</sup>1950年1月27日，喻世长把十几张卡片接连起来，有两三千字，可以成一篇文章了，才开始“感到了轻松”。<sup>⑦</sup>1月29日，喻世长把一个月写的自传检讨念给屯听，屯提出了批评，说他“完全犯了个人对自己的过去‘太温情主义’，总是把过去的一切不肯无情地否认了”。喻世长听了屯的批评，有所“觉悟”。<sup>⑧</sup>第二日，喻世长重新开始写自传，这次与之前的起稿完全不同。自传仍分六个时期，但每期侧重点与批评都变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回可算是对自己够无情的了”。<sup>⑨</sup>

①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32页。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96页。

③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97页。

④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99、517、524、529页。

⑤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37、538、540页。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38~539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40、540页。

⑧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41页。

⑨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42页。

在写作自传过程中，喻世长不断学习时事文章，思考“自己和历史时代的关系”，希望对于写自传有帮助。<sup>①</sup>推翻完全重新写，写写改改，因此重新写的自传比上次花的时间更长。至5月18日，喻世长的自传大纲比原稿已变动了三四次，增加了不少内容，达10小段，8000字，并因为思想的进步，“这次写的是既扼要而又深入多了”。<sup>②</sup>屯看了后，提出一些意见，喻世长又进行了修改，对“政治见解说得再详细些”。<sup>③</sup>因为很快要出发去贵州调查，喻世长加快了自传的撰写，6月2日，补充自传到凌晨2点多才睡，6月4日夜里11点，“大功告成”。<sup>④</sup>

自传写完后，喻世长与同事、朋友进行了交流，看到了与他们自传写法的不同，也听到了批评，感觉自己“思想转变还是模糊的”。<sup>⑤</sup>所以到贵州调查期间，喻世长还在思考“时代转变与思想改造的问题”，反思自传哪里写得不够好，“想再把自传深一步地写”。<sup>⑥</sup>

从一开始，喻世长就清楚，自传是要上交组织，进行公开批评的，<sup>⑦</sup>在写作的过程中，也在所里会议上不止一次进行过报告。<sup>⑧</sup>写完后也给亲密的朋友说想要发表的事，但因为他“没地位，带不动别人”，所以《北大月刊》《人民日报》不会给登。<sup>⑨</sup>虽然喻世长的自传未能刊登在报刊上，但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的自传，仔细梳理了个人历史上的每段经历，重点是批评思想中存在的错误人生观，如“超世”思想、<sup>⑩</sup>小资产阶级意识、个人主义等，以及联系自己和时代关系提出政治见解，最终达到自认为的“更彻底地改造”思想的目的。<sup>⑪</sup>

### （三）进行政治学习

从1949年2月北平解放到1950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以大学教师为主

- 
- ①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617页。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624、625页。  
 ③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626、627、628页。  
 ④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635、637页。  
 ⑤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639、641页。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668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99页。  
 ⑧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31、535页。  
 ⑨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639页。  
 ⑩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55、473页。  
 ⑪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41页。

要对象，兼及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运动。这一活动兴起的初始阶段是分散的，并不是全国性的统一运动。1949年3月，北京大学沙滩教学区的190余名教师中有150多人参加了14个学习小组。学习组织多是自发产生、自由组合。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活动，最初由北平各大学的党员教授、进步教授根据党的意图发起，教师自愿参加，没有强迫。政治学习运动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内容涉及个人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政治历史、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许多方面，重点在政治层面，集中检查原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存在的“超阶级”“超政治”思想，检讨作为这些思想之基础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sup>①</sup>

从“讲助会学习小组”开始，喻世长参加了多种形式的学习小组，这些学习小组有临时召集的，也有常规性的，但都可算作政治学习。<sup>②</sup>在解放后的前几个月，北大的政治学习，在内容上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主要是讨论时事政治。喻世长参加的政治学习内容多是围绕争取讲助权益、反对官僚作风。因和自己密切相关，喻世长积极参加，有时自己还作为召集人。<sup>③</sup>

1949年暑假期间，以北平、上海高校为主的政治学习活动全面展开。<sup>④</sup>同年9月，北大总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学习的口号，10月，总支指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学习的四个条件，其中之一是通过座谈会、壁报及政治学习，使大家明确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sup>⑤</sup>喻世长所在的研究所，政治学习的内容也随即转向新民主主义，主要包括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协共同纲领、国家与政治、经济与政治、“民主集中制是否限制个性发展”等。<sup>⑥</sup>

新的时代“令人进步”，<sup>⑦</sup>北平解放后，一切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虽然有时感到凿枘扞格，但由于新生政权强大的感召力、事实发生变化的实际效力、周边环境的直接影响力，以及自身具有的调节力，喻世长对新的政治、社会环境的适应并不太困难。在1949年9月，在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还未在全国掀起高潮时，喻世长就已经觉得自己的“思想是需要改造

①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30~32页。

②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92、373页。

③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92、442页。

④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32页。

⑤ 叶向忠：《新生的北京大学——学生工作的根本转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的黎明》，第347页。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12、442、460、488、490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284页。

的了”，“要发掘错误的根源”，只是还“一时没有能对问题有清晰的了解”，“不能清晰地判断出错误的根源与应改造的范围”。<sup>①</sup>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全国的教育行政已经统一，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提出：“新区学校整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这表明党的文教与知识分子政策的重点，已经从保持原有学校与人员的稳定转向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会议以后，政治学习立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并迅速掀起高潮。<sup>②</sup>北大的学习活动也在1949年11月开始由党组织领导，并进行重点检查。<sup>③</sup>这样，政治学习就慢慢从知识分子自觉自愿的活动变成执政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项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sup>④</sup>

喻世长感觉到政治学习氛围的变化，如1950年2月3日的政治小组，喻世长本来“准备了一下”，但被“安排好了”，不叫他知道。“每人报告一段”，“原因是今天有个共产党员新参加小组”。他“没留情，把讨论过程缺点明白指出”，但遭到同事的“围攻”，以致散了会自己“很不自在”，“感到势力孤单”。<sup>⑤</sup>这种带有强制性的政治学习占用了上班时间，有指定的内容，又常有共产党员参加，所以，喻世长感觉这种政治学习是“敷衍式的”，大家都“没兴趣”。<sup>⑥</sup>

当时，知识分子在面对大量强制性的政治学习时，多多少少都会有些自己的看法。就喻世长个人来说，他在日记中表现出的不满情绪是真实存在的，但也可以看出，这不是他思想中的主导。据其日记记载，早在1946年1月他就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行学习，从那时开始到1949年7月10日，解放前后他买的“新思想有关的书”，共5批26册。<sup>⑦</sup>从1947年春天开始，他在教书时就“吐露一些左倾的思想”。<sup>⑧</sup>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早期接触新民主主义思想比较主动。同时，对于国共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以及国民党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喻世长也有深刻体会。结合北

①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426页。

②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30页。

③ 叶向忠：《新生的北京大学——学生工作的根本转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的黎明》，第348页。

④ 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32页。

⑤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45页。

⑥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562、561、577、605页。

⑦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72页。

⑧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307页。

平解放之初喻世长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以及较早投入写自传等可以看出，他对思想改造是比较积极、主动的，有时流露出的不满，更多的是针对改造的形式和成效。

#### 四 余论

经过参加革命活动、阅读马列主义有关书刊、听时政演讲、参加政治学习、写自传等，喻世长不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调整。到了1950年12月，他的思想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能想到我该如何在进步的组织内，忠心地帮助他人……我已经参加了工作，我不再是局外人了。我是过了十几年而不讨好的人，但是现在我已经由空中落在地上，落在人民的园地里，我爱人民，人民也需要我，我很愉快了。”<sup>①</sup>

喻世长出身普通家庭，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具备了一定传统文化的底子，但又接受了新式教育，在解放之前，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却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谓那个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缩影。这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虽然生活境遇并未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但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目睹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希望民族强盛，同情和拥护革命，渴望着新社会的到来。不像有一定社会名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走向新社会的过程中没有背负太大的历史包袱。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大部分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内，改善了经济境况。

1949年中国政局发生大变化，国民党政权垮台，新中国成立。这种政权的变动使绝大多数普通人受到了国家政治形态以及相关的政治事件、制度和观念的深刻影响，<sup>②</sup>而其中，“知识分子作为公众中最容易关心公众利益的成员，他们通常很难不和政治扯上关系”。学界对1949年后政权变动时期知识分子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主要侧重于有一定社会名望的大知识分子、作为群体（整体）的知识分子，而较少考虑到政权变动对于作为普通人存在的他们在社会认知、行为应对、心理调适等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其实，“大多数可以被当作知识分子的来看待的人，都未必承担起太高的道德和正义的衡量标准”。在任何时代，包括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只是普通人，后人在看待他们时，尤其是进行历史研究

① 喻世长著，王金昌整理《建国日记》，第784页。

② [美]希梅尔法布：《新旧历史学》，余伟译，新星出版社，2007，第35页。

时，应“首先把他当成普通人来看待，特别是要从人性的角度去诠释和理解”。只有“先做到充分理解”，才能对其在政治转型时期的所为、所思进行“客观评价”。<sup>①</sup>

在政权变动时期，每个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人生境遇或许有不尽相同之处，但有一点应该是相同的，就是大多数普通知识分子不像著名知识分子那样面临去留的抉择，他们多顺其自然留在了大陆，更关心的是如何继续工作及生活问题。因为整体所处环境相似，大部分普通知识分子的人生境遇相似之处更多一些。所以，对普通知识分子加以考察，才能窥见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权变动时期真实的变化历程，深化对新中国成立后知识界发展状况的认识。

以喻世长个人来说，解放前的所见、所感使他痛恨国民党政权，憧憬新社会的到来。北平解放后，喻世长没有犹豫和怀疑，第一时间满怀热情地投入革命，在面对强制性的政治学习时，虽然也有过不满和抱怨，但他真心认识到，自己确实需要改造思想，要为人民服务。如果说，新中国具有一种无法抵御的魔力，一种极富感染力的“场”，让人振奋，让人想动，<sup>②</sup>喻世长心中早已存在的“磁”便正好与这个“场”契合。1949~1950年，中国的政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喻世长在内的许多普通知识分子通过自己观察、理解与体验，自觉地投身革命、改造思想。

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在论述思想改造运动时，多强调其外在强制的一面。但“强制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虽非自愿却如此自觉地接受改造。<sup>③</sup>本文以喻世长日记为基础，对新中国成立前后北平一位普通知识分子在政权更迭、社会改变中主动向新社会靠拢的行为和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也许能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种符合历史场景的普遍性个案。

① 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前言”，第14、4~5、10页。

② 许纪霖：《知识分子十论》，第155页。

③ 许纪霖：《知识分子十论》，第152页。

## History of the PRC

“Battling” and “Reforming”: The Changing Trajectory of Intellectuals’  
Thoughts during the Liberation of Peking—Focused on *Yu Shichang’s*  
*Diary*

*Li Yang / 115*

**Abstract:** Yu Shichang, a normal Chinese intellectual, entered the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at Peking University in 1948 and experienced the inflation and seizure of Peking in the wake of the founding of PRC.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RC, as a young teaching assistant, Yu and other colleagues made attempt to reform their work unit but failed at last. The thought remolding of Yu revealed that how he accepted the new ideological narrative system and how he in turn employed this new skill to practice further battle. This entire process envisioned the complex changing trajector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ought du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Keywords:** The PRC; Intellectuals; Thought Trajectory; *Yu Shichang’s*  
*Diary*

Getting Closer to the Party: The Self-Adaptation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Founding of the PRC—Focused on *Yu Shichang’s* *Diary*

*Ding Rui / 138*

**Abstract:** As an Ordinary intellectuals, in the period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Yu Shichang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school activities, and he adjusted his thoughts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the new era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environment and situation. In this process, Yu Shichang also had dissatisfaction and contradictions, but he felt the corruption of the Kuomintang regime, and he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w era, therefore, the change of his thought had obvious initiative and consciousness. Yu Shichang’s case study can be an appropriate annotation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compulsion” in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Intellectual; Reform of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Self-adjustment

### The CPC’s Recognition and Arrangement on Local Cadres’ Learning Issue in Early PRC: A Case Study of Shanxi’s Practice

*Chang Libing / 158*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RC, in order to recover and develop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nd to reorganize social order, the CPC made effort to train its cadres with culture and other skills, with intention to make strong leading forces in grassroot level. This article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polic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with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First, it seeks to map out the certain features of the training; secondly, it seeks to understand the real dynamism and difficulties; thirdly, it uses Shanxi’s practice as a case to reveal real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Finally, it seeks to offer some thought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local cadr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socialist China.

**Keywords:** The CPC; Cadres’ Learning; Local Cadres; Socialist Reform in Rural Areas

## Academic History

### My Way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Study

*Wang Di / 191*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practice about methodologies of studying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specially studying lower-class people, which generalizes the author’s efforts in methodologies during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exploration of methodologies has enabled the author to continuously innovate his research and kept his works fresh. This article synthesizes some of the opinions ex-